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

桑 兵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女性史这一研究领域,不仅在欧美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硕果累累,所产生的崭新视角和方法,带动了整个史学的发展,而且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1977年)、中国大陆的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1978年)、河南的女性学会(1985年)、郑州大学的女性学研究中心(1987年)、台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1980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两性与社会研究室等,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则成立了专门课题组。同时出版了专门杂志,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台湾的《妇女研究通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妇女与两性学刊》、以及专门的女性学丛书等。其实,女性史研究在80年代以前也决非外国学者的专利。现代中国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晚年致力于明清文化史,所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堪称东方女性史研究的代表作。虽然他戏称“著书唯剩颂红妆”,但这不仅由于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与韵文的关系特别密切,必为开创诗文证史者所瞩目,而且从为女性鸣不平来发抒对自由自尊独立思想的追求,已成为古往今来中国知识人的通例。我在这里想清理一下近年来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片断思索,故不揣浅陋,斗胆以局外人身份发表一孔之见。

一、今日的女性观与昨日的女性观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在美国随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兴起,自70年代开始形成气候。日本的一批女性学者从70年代末起,相继投身这一领域。台湾学者在研究方向及方法上很受美国的影响,随即跟进,并有一批成名的男性学者与美国学者合作研究。大陆方面,原来的妇女研究主要是作为革命与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此外便是历史名人或英雄传记。受国际女性学的影响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到80年代中期才具雏形。总括上述各方,欧美在理论方法上具有创新带头的作用,若干领域确有真知灼见及学术建树;日本和台湾则情报周详,具体深入;至于大陆方面,研究工作加速追赶,但所长暂时仍在史料的编辑。^①

就史学而言,史料的收集整理具有头等重要性。在编辑出版方面,台湾和大陆颇有成就。1975年,美国李又宁教授和台湾张玉法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下册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李又宁教授又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华妇女自叙诗文选》第一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此外,台湾的“法务部调查局”还编辑出版了《中共妇女运动原始文件汇编》第一辑。大陆则编辑出版了《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史料选编:1929—1935》(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广东妇女运动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不过,与近代妇女史料之浩瀚相比,上述也还是九牛一毛,而且总体上看,编辑者的视野仍有

① 参见秋吉佑子《现代中国女性研究的特征与课题:以中国、日本、欧美为中心》,《近邻》(近きた在りて)第13—15期。

局限,有的甚至带有先入为主的框架。编辑史料,应当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将历史文献提供给研究者,以期从中读出历史的本相,至少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而一些史料选本,却往往成为某些教科书的敷衍。这种重新组装过的历史图象,虽有便于理清线索之利,但对于喜欢走捷径的研究者,很容易产生误导的负面影响。

在上述各种选编史料集中,李又宁、张玉法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虽然时间最早,但两位学者研究有成,功力深厚,至今仍是最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上乘之选。只是经过 20 年光阴的消磨,以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所带动的广泛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检讨增补。以这部资料集所涉及的晚清那一段历史而论,对于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时期无过于戊戌至辛亥。这不仅由于非教会系统的新式女子教育在此期间产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认可,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专门面向女性或鼓吹女权的报刊书籍陆续出版发行,各种女性团体相继成立。其中涌现出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女性,如吴孟班、张竹君(上海女子兴学保险会)、林宗素(闽中女学会)、郑素伊(对俄同志女会、慈航社)、杜清池姊妹(广东女学会)、薛锦琴、陈颢芬(《女学报》、上海中国女学会)、吕碧城等。她们努力振兴女学,提高女权,并与当时各地的新学名士或绅商官各界有着多重亲友关系(如张竹君认李平书为义父,林宗素为林白水之妹,陈颢芬为陈范之女,吴孟班为丘震妻,上海中国女学会会员大都是中国教育会会员的亲眷),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她们的积极活动下,早在 20 世纪初叶,就在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组建起妇女团体,成为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然而,她们的生平事迹及言论著述,大都湮没无闻,与之有关的组织和事业,也鲜为人知,令人惋惜。这些人名气虽然不及秋瑾等人,有关的资料又相当零散,但从各种报刊、档案、公私函电、以及日记小说中,不难搜集到相应的记述。而且,所谓影响的大小,往往受时局变化的左右,尤其是筭路蓝缕之功,更容易被后来居上者的声势所掩盖。1902 年春夏成立于上海

的中国女学会,汇聚了当时沪上新女性的精英,并得到新学界名士的支持赞助。该会最初为归安吴孟班于1901年创议,开始“应者盖寡,久而未遂”^①。是冬,吴氏染喉症而亡。其夫丘震原是庚子中国国会书记,“平日愤中国之不振,病在无学,发愤研究东西学术。”1901年又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讲求武备,被梁启超称为铁血派。后因病归国,以妻丧恸而咯血,亦于1902年5月病故。“东南士夫钦二人之才,悲二人之遇,相谋在上海平江公所特开追悼会”。届时与会者凡145人,“而外处寄到之挽语哀辞尤不可胜数云。”^②沪上新学名士蔡元培、章炳麟、叶瀚、汪德渊、吴保初、孙毓筠、蒋智由、蒯寿枢、王季同、王慕陶等纷纷敬献挽联,痛悼这对“戊戌党锢以后大呼政治革命,支那奴隶之国创闻男女平权”、“亦侠亦情儿女英雄齐下泪,是夫是妇政潮学界两相关”的革新伉俪。^③中国女学会也顺势而成。

女性史研究中史料发掘的不充分,更多地表现在各种论著之中。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有近代史料太多,收集难以周全之叹。而学风散漫,研究者往往不能坚守学院化的正轨,选题过大,通史居多,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在此基础上重述历史,不免浮光掠影,甚至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仅以与近代女性史关系甚大的缠足问题为例,这个被与八股、蓄辫并称为三大国糟的特产,曾引起海外学者乃至世人的广泛关注。此一与近代中国女性史相始终的独特陋习,有关学者鲜有不加涉及。然而,尽管专门和相关的著述不少,以笔者的孤陋寡闻,至今未见有引用姚灵犀编《采菲录》1—4编及新编者。这五册书又名《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后来还选编《采菲精华录》二册。主编姚灵犀乃近代文坛怪杰,著有《瓶外卮言》一书,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采菲录》编印于

① 《上海女学会演说》,《选报》第20期。

② 《追悼志士》,1902年7月2日《大公报》。

③ 1902年7月4日《大公报》。

20—30年代,其时缠足已成末路,而编撰者并不带批判态度,甚至怀有明显的眷恋惋惜之情,收罗莲国遗老的怀旧之作,其中夹杂不少秽褻处。然而,所录各种有关缠足的诗词文章,不仅有助于详细了解缠足的历史,更可以清楚地掌握缠足的形制、变化、装饰、分布、以及与此有关的风俗人情,特别是这一陋习所以历久不衰的文化心理因素,可谓中国缠足史料的集大成。书中许多诗文由拥莲派写来,能够令人体察到反对派锋芒所向的另外一面。未经历那个时代的学人,不看这套书,恐怕很难深入理解这一病灶,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缠足时代的两性关系。记得一位友人论证19世纪中叶上海人并无排外意识,举例之一是说扬州妓女颇受欢迎。其实,此事原因多半在于扬州女性小足天下闻名,时称“北有大同,南有扬州”,迎合了汇聚上海的一班莲癖之士的嗜好,与心态开放与否关系不大。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缠足不仅有病态的审美价值,而且缠与不缠、缠的好坏及形制,成为反映社会等级身份、地方文明程度和风俗人情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套资料不合时尚,当时印数仅500册,正规图书馆保存甚少。60—70年代之交,曾有人在香港《明报月刊》著文介绍,并有出版社广告征求原书,打算再版行世,似未实现。笔者调查资料之余,曾向国内及日本各大图书馆查阅,结果几乎没有一家完璧。遍览海内外有关缠足的著作,大都仅据方洵的《香莲品藻》等书加以敷衍。如果揣度不误的话,前些年天津作家冯骥才写作小说《三寸金莲》,应该看过姚氏的书,否则很难那样如数家珍,栩栩如生。姚著当年恰好也是由天津某书局印行,想来当地或保存较全。不过,冯著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也不以为这类国糟应当揭开来让世人猎奇玩赏,更不以辜鸿铭似的故意视国糟为国粹为然。但对于研究者,特别是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片面距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哪怕被蒙蔽的只是毒瘤。善意的遮丑或曲意的辩解,都会导致历史真实的变形,从而产生错解。而单纯从今天女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批判,恐怕也无法具“真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国故自身,无

论它是国粹抑或是国糟,总之,我们不能不给它一个文化史上的地位,而研究它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之存在。”^①从片断与片面的资料中,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历史映像。而失却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历史学学术价值的降低。

二、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

戊戌辛亥间,女权运动渐兴,各种报刊书籍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前,妇女报刊已有29种^②。通观这些宣传品,发觉鼓吹女权最力、言论最激进的,往往竟是男性。如在此期间创办较早、历时最长、影响较广的《女子世界》,其创办人、编辑和主要撰稿者,如丁初我、徐觉我、柳亚子、蒋维乔、沈同午等,便是清一色的男性。可惜学者失察,误以须眉为巾帼。《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在指称《女子世界》创办人丁初我时,全部用“她”为代名词。载于第四集的《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更将丁初我列入“女主编、女主撰、女记者”行列,说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名门闺秀’”。其实丁氏并非女性。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丁初我、徐觉我、殷次伊三人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主持者。该支部成员均为男性。担任《女子世界》撰述的蒋维乔,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与丁初我的交往情形:“余识丁君初我于江阴南菁讲舍。相见之始,有如夙契,晨夕聚首,相与讨论学问,纵谈天下事,而知初我为绩学之士也。初我为人慷慨任侠,痛中国之不振,社会之腐败,于戊戌年间即集合同志,创建书社,购置新书新报,任人观览,以开通风气,又立常昭小学堂,教邑中弟子。”南菁书院在近代中国传统学术史上颇有影响,时虽改学堂,尚未开男女同校之禁。

① 《儒家之精神的社会政策》,《周子同经学史论著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5页。

② 《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1898—1918》,《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0—693页。

同日记又说:“《女子世界》为常熟丁君芝孙等所创,余每月担任论说一篇。”^①则丁芝孙与丁初我应为同一人。理由之一,蒋维乔日记壬寅(1902年)十二月除夕自识称:“余昔从事学问,无一定之目的。今岁南菁改设学堂,既到堂后,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南菁理化教习钟宪曾先生学最富,同学诸君常熟丁君芝孙为最。”与前引评论丁初我语相吻合。理由之二,《苏报》1903年6月24日《纪常昭塔后小学校二则》记:“常昭塔后小学校自戊戌开办以至壬寅,经徐念慈、丁祖荫、殷崇亮等大加改良……其堂中热心组织诸君列左:曾朴(孟朴)、张鸿(蛮公)、丁祖荫(芝孙)、殷崇亮(次伊)、徐念慈、徐宗鉴(维公)、沈同午(职公)、宋麟(侠公)、朱积熙(远生)。”则丁氏名祖荫,字芝孙,号初我。他与徐念慈(觉我)、殷次伊等是在常熟兴办各种新事业的骨干人物,在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的前身敦学同盟会中,徐任总理,丁、殷为常议员。^②《女子世界》另一主要撰稿人沈同午为该会干事员。他们与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的柳弃疾(亚子、亚庐)、金松岑(天翻)、常州的蒋维乔(竹庄)等交善。这些人大都成为《女子世界》的同人。

辨认丁初我的性别,事关近代中国男性之女性观与女性之女性观的差别这一重大问题。所谓《女子世界》持论激进,主要不是指该报的反清革命倾向,因为政治态度的不同,在女性中同样存在,而是指在男女两性之间否定男性、尊崇女性的极端表现。有人认为该报“在强调提倡女权的时候,过分夸大了女子的作用,表现了泛女权思想。”^③其实这与其说是泛女权,不如说是唯女性更为妥贴。而这种女性至上的倾向在中国男性知识人中相当普遍。其表现有二,一是以女性为理想化人格的代表,小说《红楼梦》最为突出,其它如《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亦可见大略。二是对女性寄予无限

① 《鹤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初四日、十一日。

② 《敦学同盟会会员题名单》,1903年3月23日《苏报》。

③ 徐玉珍:《女子世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47页。

同情，文学中如现代小说《家》、《春》、《秋》。而陈寅恪先生之于陈瑞升、柳如是，则两种情怀兼而有之。在辛亥时期由妇女主办或以妇女为对象的报刊中，关于复兴女权、家庭革命、破除纲常、经济独立、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问题，不仅在《女子世界》之前出版的几种刊物词锋远不及其犀利，就是在此之后问世的报刊，能与之匹敌的恐怕也只有1907年底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神州女报》。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贞操节烈的抨击，以及后来关于娜拉出走后怎样的争论，虽然两性营垒中各有分歧，却总由男性发端肇始，呼声也格外强烈。究其根源，除男性受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外，至少以下几条原因可以考虑。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所负责任往往较父亲大，影响也深，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上的恋母情结，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后代对待女性的态度。其二，与此相对，父亲作为家长，威严有余，慈爱不足，往往变成专制主义的代表化身。而反抗父权的专制，同样影响两性观。加上这些男性的唯女性主义者多生长于士绅大家庭，身受家长的压抑，对于比自己地位更为低下的女性，无论后者自觉或蒙昧，易产生强烈的同情心；而对统治社会、主宰家庭的男性油然而生厌。怜悯与颂扬女性，正可抒发对人间压抑不平的愤懑。柳亚庐在《女子世界》第9期发表的《哀女界》，可以为证：“金一（松岑，《女界钟》作者）有言曰：‘凡身领压制之况味，受压制之痛苦之人，必痛心切齿于压制政体，不愿世间有此等恶现象。’旨哉斯言，其伤心语哉。吾非女子，而压制之惨亦身受之矣……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睹斯惨状，同病之感，我又乌能已于言。”

男女之女性观的差异，还由于男女实际的社会地位及境遇不同。以吕碧城为例，其“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她曾在秋瑾所办《中国女报》上撰文呼吁女子结团体，兴女权。但对于自由结婚之事，却认为：“今日此种社会，尚是由父母主婚为佳”。因为“父母主婚虽有错

时,然而毕竟尚少;即使错配女子,到此尚有一命可以推委。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委过,连命字亦不许言。至于此时,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者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外,几无路走。渠虽长得不过二十五岁,所见多矣。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严复劝其“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后来她果然独身一世。^①吕氏言行并非例外。1907年,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四川女学堂学生)与译学馆男生屈疆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风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性间态度的差异。当时中国妇人会在北京厂甸为江北灾民举行募捐演说,屈疆听了杜成淑的演讲,“慕杜女士为人之正派”,私下托人转交一函,表达爱慕之情,并约期一晤,函中有“天假之缘”、“自由”等词句。而杜氏却如蒙大辱,一面四处投诉,一面公诸舆论。译学馆当局只好将屈生开除,暗中送他出国留学。杜氏答屈疆的公开信颇能反映时代及两性间对婚恋态度的不同。其文虽长,不妨照录于下,以供解析:

“初十日下午突接来信一函,系由本会义务小学生胡润仁手交来,云系会所前茶摊上屈姓托伊送交杜二小姐者。淑比拆阅,见其中有信笺一纸,另有小洋片一张,中铅印屈疆二字,左边铅印字伯刚,浙江平湖县人。淑闻竟茫然不解所谓。然玩其词语,颇涉猥鄙俚薄,而究不知其为何如人。译其名片背面洋文,系京师译学馆等字。嘻!异哉。夫以中国女界沉沦数千年于兹矣,

①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7—839页。

幸朝廷变法维新，凡稍有思想者均汲汲以求学为重，不独男学界日求进步，即女学界亦争自濯磨。故去年吾父与世叔王君以南城女学不兴，爰与同乡诸先生议定而有四川女学堂之设，将以扶植女权，俾人人有普通知识。创立一年，颇有成效，而于修身敦品一端，尤为注意。淑固素娴家教，夙敦学品而孜孜勉为完全人格者也。今者江北水灾，待赈孔亟，吾父提倡中国妇人会商人会员，在厂甸劝募，淑与吾姊成玉等均司书记。事虽创举，颇为京师各界中人所赞成，凡来买图上捐者最占多数。本会中人虽当严寒，而热心公益，义不容辞。何图君为学生，竟有此不规则之举动也。

来信开首云识君已将一载。淑生平所曾谋面者均系吾父年世尊辈，每晤一次，随登日记，并无屈姓其人。君云识已一载，究竟何时通名，何时谋面，何时聚谈，君言之若甚得意者得毋丧心而发狂病耶？又云天假之缘，淑更不解天缘二字，从何说起。或者此次天降奇灾，淑等售图劝捐，风霜历尽，劳怨不辞，以为江民杯水之助，乃疑为钟情来耶？君云欣幸，淑窃愁苦之不暇也。

即女友之说，现在世界开通，人人讲求学问，交换知识，亦文明之通例，况会所隔茶摊相离不过十步，君如仰慕淑之高雅，固无妨落落大方，光明磊落，致敬尽礼，道达来意，方不失为学生资格。淑稟知父母认可后，即能接谈，何必给小学生私传信柬，行同狗彘，心为鬼域如是。况淑之学问渊博，君既从徐女士处问知，何不即请徐女士介绍，达其诚意，而必为是私相授受，以售其不轨之谋。淑固四川女学生，诚不知君视淑为何等人。君之所以自处者，其居心直可诛而不可问也。至于自由之说，中国女界尚在萌芽，循礼守义，固粹在斯。淑家世以孔教为尊，最不取自由之说。凡世之号称自由

者,大都皆野蛮之自由,非法律上之自由,满口卢梭,居心盗跖,一动一言,毫无公理。在彼方自诩文明而已,不值识者之一噓也。至云星期一陶然亭可图良晤一节,尤为无状。淑既不相识,何良晤之可图?君既为学生,应知教育,狂悖如此,直与勾引良家妇女者同科,其罪有不可胜诛者矣。

嗟夫中国至今危弱极矣,将来事业,责在学生。译学馆为京师独立高等之学堂,闻平时教育最称完善,而竟有败类如君者厕其间。设学生均如君者,中国前途大可知也。现女界黑暗,刚放一线之光明,凡学界中人,知女学关系匪轻,方期极力提倡,而遇有女学生于此,应如何肃然起敬,以相与维持。而不谓君竟鄙夷视之,等诸下女。君固俨然人也,俨然学生也,而品行顾如是乎?又况此次劝募,凡稍具人心者,见淑等以孱弱女子,值此新春,不暇游玩,每日矗立于严风冷雪之中,而为是售图募捐之举,警厅保护之,政界学界各界赞成之,以为是中国向来大有创格,方谓此关打破,将来二百兆之同胞女子皆可出而任事,发愤自立,不致貽男子内顾之忧。而不谓君竟意存破坏,至以私信传递。诚恐此风一启,顽固者得以藉口,而女子世界从此复处于黑暗,无复有拨云见天之一日。君试思之,胡甘为男女学界之蠹贼,世界文明之公敌也。淑得信后,本拟置之不理,继念君之为此,匪独关于淑一身之名誉,且关于译学馆及男女学界之名誉,更有关于中国妇人会之名誉。君以私来,淑以公布,使□下政界学界工商实业界中人裁判之。君函除送学部译学馆外,特登各报,幸恕唐突勿怪。”^①

① 1907年2月27日《大公报》。

·以时下的眼光来看,这封信自相矛盾处不少。或者说,以现有的理论逻辑,很难理解和解释当时人的思想。其实,屈疆并非登徒子,不仅学业优秀,思想也颇为开通。因而译学馆的同学均为他打抱不平。此外,革命女杰秋瑾,虽与由包办婚姻撮合、又无共同语言的丈夫分居,却不曾彻底脱离关系,身后仍不免合葬。中国女学会和《女学报》的创办人陈撷芬,竟不敢反抗父亲逼令嫁给商人作妾的成命。而一些毅然实行家庭革命、离家出走以逃避包办婚姻者,后来大都落得个悲惨结局。甚至民初共和政府也以“未有不能共和于所生之父母,而能共和于四万万人民者”为词,剥夺女学生婚恋自由自主的权利。^① 凡此种种,使得女性在挣脱束缚、鼓吹解放时不能不顾虑重重。

诚然,女子自有其激进处,只是着眼点与男子不尽相同。吕碧城的独身意向可谓一种极端表现。而吴孟班则属另一类型。人称其“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据说她“尝有身,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公恪语塞。”^② 此外,在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同校上学、同台演说、同场竞技之时,女性又刻意严格男女界限,开会时男女分列,或分室而坐。一些女子团体甚至明文规定:“演说时不准男人混入”^③,以免给顽固势力留下干扰破坏的借口。

由于两性的女性观不尽相同,各自对与女权有关问题的选择取舍乃至态度要求必不一致,研究者在处理史料时应慎之又慎。以报刊为例,笼统冠之以“妇女”二字,不免混淆性质,因为其中有由男性主办、而以女性为对象的刊物,所提倡鼓吹在女权的大前提

① 详见拙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9章第3节。

② 《道听途说》,《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

③ 《两浙女学会简章》,1904年8月25日《警钟日报》。

下,带有独特的男性眼界。而由男性或女性主办的刊物上,也分别刊载异性的文章。只有首先清理分类,进而弄清各自的身世背景、社会交往,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其言行的社会内涵及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归纳比较他们在恋爱、婚姻、家庭、养育、教育、独立、平权、参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主张要求,然后才能进入分析评论的阶段。

三、上流的女性观与下层的女性观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之一,是以文化聚合广大区域及人口,大小传统长期并存互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作为理想化两性关系的规范虽然接近或吻合,但实际的女性角色地位却相距甚远。特别在基层社会,由于小传统的千差万别,在表面共同的儒教伦理主导下,实行各式各样的规则。一般说来,基层社会对于女性的约束与控制,较上流社会要松动。这往往从形体上就能够区分。在一些地方,缠足成为体面人家女性的标志,天足则是劳动妇女的特征。这不仅表现为城乡女性的差别,甚至是夫人小姐与仆妇佣人外形不同的要点之一。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女性独有的文化规范,如女书、自梳女等,主要也是通行于基层社会。在北方不少地区流行的妈妈会等组织,更是完全由女性自己筹划运作的民间女性结社。其功能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无论从领域的拓展还是方法的运用看,显然处于前列,出现了一批给人以很大启示的成果。

当上下层社会不同的女性观念与规范因社会动荡发生移位时,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近代西式教育发展的曲折进程便是一例。尽管清政府直到 20 世纪初仍然排斥女学,到 1907 年才勉强允许女子初等教育,但下层社会对女性约束相对松弛,西方传教士很早就以此为对象开办了女塾。到 1890 年代,女生已占教会学生总数的 1/3,成为迫使清政府在女子教育问题上让

步的要因。这种影响不仅在外力冲击下发生,社会内部的变动同样会引发。太平天国席卷中国之际,广西妇女在生产和家庭中的重要角色作用随之扩大,影响其他阶层和区域。不过,由于下层社会中实际通行的规范与观念上的理想模式不完全统一,往往要从具体行为中归纳分析,而且女性本身也有角色差别(如姑娘与媳妇),迄今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出一般性结论。

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两性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性的唯女性倾向的影响。这些唯女性主义者大都出身于士绅大家庭,又具有很强的叛逆性,本能地反对男性大家长的压制。他们运用笔的社会影响力,对封建纲常伦理大张挞伐。由他们记载、描绘和批判的两性关系,被等同于现实的两性关系,而忽视了其中夹杂着作者特殊的主观情感成份,不能与现实划等号,简单地直接用作分析的依据。尤其是他们对基层社会的认识,仍然是从外部观察,或是用外部的观念观察,缺乏足够的深入和具体,其文字言论主要是反映激进知识人对同时代基层社会的看法。

四、本土的女性观与外来的女性观

中国的近代新史学兴起于清末民初,观念方法明显受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甚至左右,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领悟并进入学问无所谓中西新旧那样一种至高境界,并且从史料和传统史学中提取中国文化固有的概念方法,用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内在联系。这些外来观念,无论得自西欧还是北美,都并非由中国社会文化生成,套用来分析解释中国的情况,往往不免削足适履。但是放弃这些观念方法,又很难表达人们当代的思想意识。这是近代以来后发展民族在精神领域碰到的共同难题。就本世纪中国女性史研究而言,影响最大的理论来自欧美延续上个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和 60—70 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欧美的社会问题意识。引入中国后,由于观念与事实存在

歧异而语言的独立性又有制约思维的作用,多数人采用类似以外书比附内典的格义之法,结果对理论的领悟和对历史的把握都难免附会穿凿之弊。

近代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许多人惯用先进与落后的观念进行对比。即使抽象反对这种偏向,受了语言与方法的制约,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也不能免俗。试图使汉字罗马化的努力是极端的例子。在妇女问题上,表现之一是将西方以个性自由为前提的妇女解放观念视为文明,而以中国纲常伦理主导下的女性观为野蛮,进而把一切改变妇女形象地位的行为与反封建相联系,结果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关于太平天国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关系的分析,最为突出。诚然,洪秀全等人受过一些基督教义中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但导致太平天国前后对待妇女的态度及政策迥然不同的原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文化分层及区域文化实际规范的不同所造成的女性社会地位的差异,即由通行于两广基层社会的女性规范转向江浙上流社会的女性规范。用反封建与封建化这一类概念,其实是相当表相与外在的解释。又如晚清的不缠足运动,简单纳入反封建轨道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满族入主中原,不仅坚持本族女子不得缠足,还曾严禁汉族女子缠足。那种以先进落后别之的态度,当年为来华洋人所普遍抱持。惜阴《国学辜汤生传》记:1895年他和辜鸿铭拜访海关某英人时,后者说:“今年中国皇太后六旬万寿,应令妇女放足留纪念。余答国初屡下诏放足,积习难破,竟有甘自尽以殉之者。即问事在何年,答约在顺康两朝之初,均有此事。渠立取《东华录》检得之,始不以裹足为国制所定也。”^①

随着60—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的女性主义之女性学,对当代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中,它和社会史、通俗文化史一起,逐渐形成主流,而将原来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史、外交史逼到旁支位置。中国大陆引入女性学的理论和方法,

① 《人文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5月。

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目前除少数女性学者介绍鼓吹提倡外,真正有学术水准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即使从趋向上看,也只能说刚刚跨越将妇女研究作为政治史附属的前女性学阶段,进入以此为社会史或地方史的一个部分和环节的初创期。问题是,欧美以女性学为指导的女性史研究,产生于时空都含特殊性的社会环境,整体上是近代西方个性解放的延续和发展。它反对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而主张从女性角度重新塑造。^①姑且不论这一观念所提出的目标能否达到,即使作为“补赎史学”看,能否真正摆脱前女性学的妇女观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十分乐观。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和规范,既有对女性歧视践踏、约束压抑的一面,也有阴阳和谐、顺应自然的一面。在此制约下,女性或以找到理想的异性为归宿,或以男性为自己的角色替代。历史已经证明,这两者都不能准确地划定女性的社会位置以及自我意识。旧时代女性对婚恋自由自主的憧憬,在传统文学中多以大团圆结局,但到了鲁迅的《伤逝》,便以自由结合为序幕,美好的结局成为矛盾冲突的起点,接着更有娜拉出走后究竟怎样的困惑。而女扮男装沙场出征或金榜题名,也只是男性中心的变形。两性问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若以消除矛盾为目标,结果可能只会导致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为平等与和谐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女性的形象、位置与意识,除女性自我意识外,与男性的意向、认识息息相关,以往的男性中心即包含了女性的认同,或者说是在男性中心意识支配下的服从。那也是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一种必然。近代以来,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西方意识所带动的一切变化,总不免付出巨大牺牲为代价,到头来常有得不偿失之憾。如果一味企盼享受解放的利益,而不能承担相应增加的责任,那么失去的一切并非都能得到补偿。历史是人类的总体活动,必须同时考虑平衡协调人与自

①. 参见梁元生《近年来美国之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1994 年版。

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性本身的所有关系。作为学术研究,与其刻意追求某一方面,不如揭示这种复杂性本身。否则,任何一种新的框架,在带给人们新的刺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约束与局限。在学术史上,那种破字当头、而立并不在其中的流派,虽然名声很响,但建树往往不大。原因即在于当它全力破坏之际,也不由自主地为对象所制约。以打破男性中心史观为己任的女性学研究,在进入中国社会时,恐怕只有根本摆脱两性对立的狭隘眼界,才能真正找到女性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产生比“补赎史学”意义更大的学术成就。

(责任编辑:王也扬)

(作者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